

007386

成都市金牛区

财政志

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局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

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局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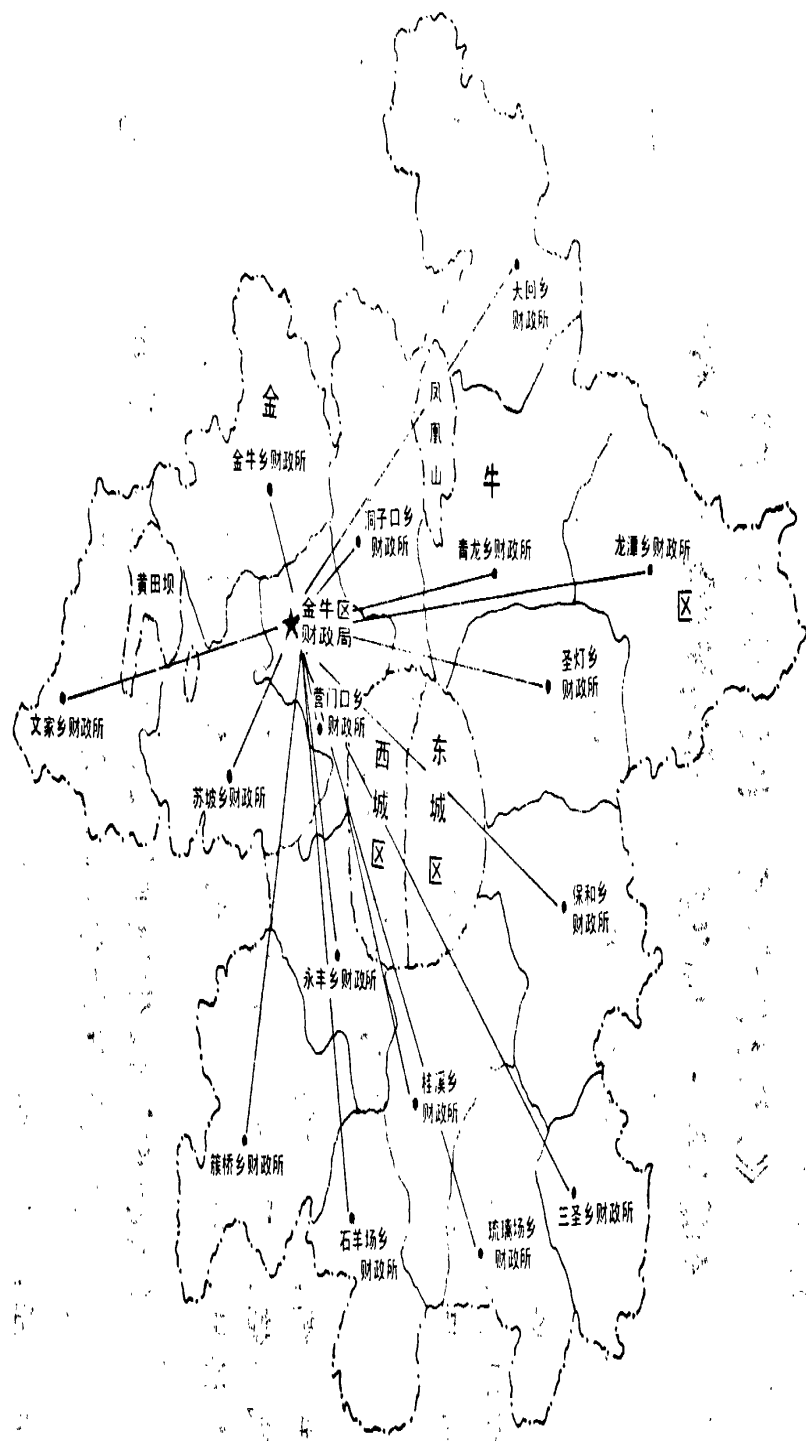
广开财源·增加财政
收入·促进经济发展。

陈作周 一九八三年
十二月

培植財源
振興經濟
為四化
建設服務

壬申年
十月
葉振鍾

成都市金牛区财政所分布示意图





金牛区财政局办公大楼



金牛区财政局现任领导干部（从左到右）李萍、王远华、曹运傑、乔林忠



金牛区财政局全体干部合影之一



金牛区财政局全体干部合影之二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 领导·编写·审查验收单位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曹运傑

副组长：李 萍

组 员：王远华 乔林忠 王光序 李兴明 冉光杰 朱华林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编写小组

主 编：杜茂金

执 笔：谭志远 王光序 肖名雄

资料员：王 政 陈书龙 殷义平 孙恪毅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审查验收单位 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主 任：吴 冰

主 审：何传俊

序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(以下简称财政志)历时一年零九个月,现已编纂成书,将为后世留点笔墨,望能有所补益。

成都市金牛区,地处川西平原,自流灌溉,物产丰富。全区面积为404.9平方公里,有人口56万,以农业为主。主产大米、小麦、油菜,经济作物有生猪、蔬菜、干海椒及蛋、奶、鱼等,是成都市人民副食品生产基地。新中国建立后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金牛区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,特别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,进一步调动了全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、农村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,它不仅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,还带动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。农村经济的变革,促进国民经济不断高涨,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986年就突破十亿大关,1990年达到1,657,760千元,比1978年增涨10倍。

经济是财政的基础。金牛区财政状况如何?《财政志》如实作了回答。《财政志》着重收集了解放初期、“大跃进”时期、“文革”时期以及改革时期以来,有关财政机构、财政管理、财政收支等方面的资料,对有历史联系的部分还追溯到民国时期,是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地方性专业志。

《财政志》在编纂过程中,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坚持党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,对历史上出现的问题,运用历史

唯物主义和辩证法，实事求是的反映金牛区财政的历史和现状。

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，要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地方志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。《财政志》由于财政工作的职能覆盖面广，它既如实记录下财政方面的情况，也必然折射当时生产、生活诸方面，尽管有得有失，将给人们以启迪，这也是我们的愿望。

曹运傑

1992年9月10日

凡 例

一、《政财志》的体例：是遵照《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》规定的基本要求编纂而成。

二、《财政志》的体裁是以“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”五种体裁，达到图文并茂。

三、《财政志》的结构：是以类系事，以事系时；以事横排，以时纵写。并照顾到史实间的相互联系。

四、《财政志》的征编范围：因成都市金牛区区域变化较大，为了使史实不致中断，在征集资料上是以原成都县地域为主线。解放前部分，主要收集原成都县的资料。解放后部分，收集了成都县、成都市龙潭区、成都市万年区、成都市郊区、成都市金牛区等时期有关资料。

五、《财政志》的行文：采用语体文、记叙体；各种表格使用阿拉伯字，但在行文中为了层次分明，兼用一、二、三等汉字数码。

六、《财政志》的断限，下限断至1990年12月，上限根据需要，远的上溯到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。

七、《财政志》的年代记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（简称解放前），用帝制纪年或民国纪年，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（简称解放后）一律用公元纪年。

概 述

“财政”是一个名词，它的概念是指一种分配形式，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形式。社会再生产是生产、交换、分配、消费的统一，财政是分配问题，属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环节。财政这种分配，是一种特殊的分配，它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，必须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，它将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价值形式集中起来，形成国家财政收入，又将这些收入进行再分配，形成国家财政支出。由于财政分配，国家始终处于主体地位，这种分配就和其它任何分配不同，它具有集中性、强制性和无偿性。

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，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。财政历来是支持国家的存在、发展和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。正如列宁指出的：“任何社会制度，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，才会产生。”（《列宁全集》第33卷第424页）。财政在我国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，曾经历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，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中，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。纵观我国历史证明：凡财政充裕则国家中兴；凡财政衰竭则国家动乱直至天亡。

我国的财政状况，在清朝中期还有相当基础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全国实征银4,359万两，实支银3,177万两，收支相抵，盈余1,182万两。嘉庆时代岁入虽稍减，然出入相抵仍有盈余。但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鸦片战争失败后，由于军需浩大，财政出现赤字。至咸丰时代，内有太平军起义，外有英法联军的侵逼，

军需急增，财政赤字增大。到同治末年岁入地丁银约2,000万两，漕折200万两，盐保、盐厘约800万两，常关税约200万两，海关税约1,200万两，厘金约1,500万两，各省按粮的捐输津贴约180万两，总数为6,000余万两。而岁出则需7,000万两以上，不敷1,000余万两。光绪中年以后，初则有中、法越南之战，继则有中、日甲午战争，后复有八国联军的侵略，战祸不断，军需巨大，国家财政已无力负担。光绪二十五年岁入仅8,800余万两，而岁出则需10,100万两。到光绪末年赔款愈重，国家财力枯竭，就庚子赔款而论，即有45,000万两，规定四十年偿清，另加利息50,206万两。如此重负，清王朝只好一面向外借债，一面责令各省摊解。但当时的地方财政由督抚自专，虽因此各地杂税繁兴，但中央得利甚微，最终导致财政崩溃地方割据的局面。

民国时期的财政收入，亦因战事不断而每况愈下，特别是自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以后，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，使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零，工人失业，市场萧条，国民经济一蹶不振。民国三十五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9,791亿元（法币，以下同），支出为55,672亿元，不敷35,881亿元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38,300亿元，支出为409,100亿元，赤字达270,800亿元。国民政府为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，一方面大举外债，仅美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以各种贷款和物资的“援助”就有28笔，总金额达50亿美元。另一方面则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，滥发纸币大搞通货膨胀。因此，随着内战扩大财政赤字的激增，法币的发行量迅速增长。抗战前，法币的发行量为14亿元，到民国三十五年已增至82,000亿元，民国三十六年增至400,000亿元，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猛增至

6,600,000亿元。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,民国三十六年七月物价上涨了六万倍,到年底更上涨至一十四万五千倍,有的地方还不仅于此。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,物价飞涨又促进通货进一步膨胀,如此循环往复,最终导致国民政府财政的破产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我国财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财政工作,提出了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的总方针,并从恢复农业生产着手,扩大对农业的投入,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家园,特别是实行土地改革后,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,农业生产连年创历史最好水平。农业收入的增加,为新中国财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8年以后,随着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,又产生了一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。全民所有制企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、生产骨干,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全国执行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,国家一方面通过调整政策,调动地方和生产部门的积极性;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财政管理,调节中央和地方、地方各级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,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。通过十二年时间的改革,农、轻、重的布局更加协调,工业、农业、服务行业的产值成倍增加,国家财政预算全面实现,新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。成都市金牛区财政,是一级地方财政,其发展经过和全国一样。1960年成立金牛区时,正值全国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,地方财政出现困难,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压缩财政开支,区财政根据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,及时实施三项措施:一、开展“反对浪费”的群众运动;二、压缩地方国营企业的规模;三、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。经过三年的努力,扭转了财政收入下降的局

面。1963年全区财政收入达到了5,718千元,比1961收入5,011千元增加了百分之一十四点一一。而且,财政收入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1965年。1966年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十年动乱期间,由于生产遭到破坏,财政工作受到干扰,区财政再次处于困难阶段。1978年后,全国执行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,农村经济发生变革,出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,带动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。区财政紧跟形势,把握时机,从资金上给予扶持,并及时调整政策促使乡镇企业向高层次发展,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财源。至此,区财政才步入稳步发展的阶段。1989年,金牛区因实现“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结余”而获得四川省政府重奖。1990年,金牛区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,当年实现财政收入111,316千元,创历史最高水平。成都市金牛区成立以来,财政工作在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方针的指引下,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,支持生产,发展生产,开源节流,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。1960年至1990年的三十一年间,共上解国库474,642千元,其中仅1990年一年即上解国库65,783千元,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综上所述,财政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,从奴隶社会到新中国的成立,都离不开财政。但是,新中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,它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财政有本质的区别。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财政,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,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,而社会主义财政,则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,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。此外,资本主义财政只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条件,不具有生产性,而社会主义财政则深入到社会主义企业内部,有明显的生产性。

大 事 记

1950年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《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县在征收农业税上，执行按户全额累进计征的规定。

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《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、党派、团体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指示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县，从当年7月开始，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。

1955年，国务院发出（55）国秘字第171号《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度。

1956年，国务院发出（56）国议周字第53号《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统一的标准工资制度。

1958年，中央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在征收农业税上执行比例税率。

1959年2月28日，根据成都市郊区人民委员会第三届九次会议决定，区财政科与区税务局合并，建立郊区财政局。（财税第一次合并）。

1960年7月18日，根据省人民委员会（60）0392号批文，建立

成都市金牛区。同时，金牛区财政局和税务局分别设立。

1962年4月21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中发(62)166号《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贯彻中央的“十项禁条”。禁条内容包括：一、不许挪用应当上缴的税款和利润；二、不许挪用银行的贷款；三、不许挪用应当归还其它单位的贷款；四、不许把生产成本范围以外的任何开支挤入生产成本；五、不许挪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；六、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；七、不许挪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；八、不许自行提高企业各项专用基金的提取比例；九、不许挪用企业的四项费用；十、不许挪用基本建设单位储备材料和设备的资金。

1963年，农业部、财政部联合颁发《关于国营拖拉机站财务管理的暂行规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进一步加强对区拖拉机站的财务管理，并执行国家补贴按作业量拨结的办法。

1964年，国家计委、财政部联合发出《关于生产企业调用基建库存设备的通知》。据此，金牛区执行凡生产企业调用基建单位物资，一律折价付款的规定。

1965年，四川省财政厅发出(65)财预字第111号《关于清理小金库的若干具体规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开展清理小金库的工作。清理的原则是：国家的上缴财政；集体的留给单位；个人所有的发还个人。

1967年，四川省财政厅发出(67)财厅字第17号《吴波同志在五月五日电话会议上的讲话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贯彻以下四点要求：一、抓革命、促生产、促工作；二、加强财务管理，大力组织收入；三、积极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；四、紧缩财政开支，实